

編者按：本文是2018年6月19日及20日在珠海舉行的第五屆“澳門·珠海警務論壇”中入選的其中一篇學術論文，本文作者並獲安排上台發表演示。該次論壇的主題是“攜手並進，邁向未來——大灣區背景下的澳門珠海警務合作”。

淺析跨境電話詐騙犯罪問題及對策

澳門司法警察局經濟罪案調查處首席刑事偵查員 何嘉麒
澳門司法警察局報案及緊急行動中心一等刑事偵查員 洪光輝

【摘要】隨着“十三五”正式落實推行粵港澳大灣區規劃，2018年澳門保安範疇施政方針推行智慧警務，落實科技強警警務理念配合大灣區的發展，以深化粵港澳三地警務合作。由於澳門所發生的電話詐騙案件多是在內地使用通訊設施及銀行工具實施犯罪行為，而有關匯款及取款多在內地，因此，現時的電話詐騙案件的偵查均以內地為主。本文將對跨境電話詐騙犯罪問題和打擊難點進行分析，並着重就建立完善跨境、跨部門綜合治理打擊體制提出對策思路。

【關鍵詞】電話詐騙 大灣區 珠澳創新警務模式

一、前言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是指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惠州、肇慶、中山、東莞、澳門及香港等11個核心城市組成的城市群體，有關城市在地理位置與自然條件上的相似性，以及歷史上的經濟和文化的關聯性，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地域單元。其集聚與擴散的強勁優勢，是目前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速度、實力等方面最具發展前景的城市群之一。

2014年12月，國務院於廣東設立自貿區，包括廣州南沙自貿區、深圳前海自貿區及珠海橫琴自貿區，總面積達116.2平方公里，廣東的自貿區，立足面與港澳深度融合。就珠澳而言，橫琴新區與澳門隔海相望，最近之處相隔不到200米距離，而橫琴亦已劃出一平方公里建設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在校區內實行的是澳門制度。

除此之外，港珠澳大橋即將通車（編者按：該大橋已於2018年10月通車），珠海的地理位置將由過去的終點站，轉身變成珠三角

地區的重要樞紐，而大橋對珠澳是一個重大的里程碑，尤以澳門回歸以來，與珠江三角洲地區（現為大灣區）在各城市自身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形成了蓬勃發展經濟合作為首先試驗。近年來，粵澳兩地政府亦積極推進了《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並通過粵澳合作聯席會議，雙方達成了很多有關合作的共識。故在此一前提下，除了經濟貿易等議題外，警務合作亦須進行新的創新、互助、合作。

因此，按照國家對大灣區的合作協議等大綱，以先試先行為原則，在9+2的大灣區城市群內，先試行有關協作，以增加各城市之間的各種合作、資訊互動、資源互享等合作協議。

在澳珠兩地警務合作方面，由於澳門與珠海海陸相鄰，兩地之間的人口流動極為頻繁，因此在打擊犯罪方面，兩地互涉的案件數量亦較多。兩地警方於早前已建立良好的及密切的關係，尤其在近年分別透過“澳珠警務論壇”以進一步拓展兩地警務合作，深化合作層次，提

升兩地警務交流的水平及增加其效益。

珠海市公安局於較早前曾參與由國家公安部督辦的“8.12”跨境電話詐騙專案偵查工作，且獲得成功，故在打擊電話詐騙案件方面，已具備優越的條件及豐富的經驗。因此深化澳珠兩地的警務交流及合作，對打擊有關電話詐騙案件，必定事半功倍。

二、澳門電話詐騙犯罪現況

電話詐騙，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法律用語，而是對犯罪份子利用電話進行詐騙活動的簡稱。初時犯罪份子的確僅僅是通過電話的方式實施詐騙活動，後來隨着科技的發展，犯罪份子的詐騙方式也出現多樣化。現時“電話詐騙”是指犯罪份子通過電話、網絡和短訊等方式，編造虛假信息，設置騙局，對受害人實施遠程、非接觸式詐騙，誘使受害人給犯罪份子匯款或轉帳的犯罪行為。其中跨境電話詐騙主要是利用兩岸及國際警方跨區域協作難的漏洞，將犯罪空間不斷擴大，成為打擊難度最大的一類特殊詐騙犯罪。

（一）電話詐騙的趨勢

根據統計數字，澳門司法警察局於2011年至2017年間，電話詐騙的專案調查案件數量，自2013年5月開始呈上升的趨勢，2015年5月的案件數更達至41宗，創有統計以來單月最高記錄。不過，電話詐騙案的數量在2015年下半年開始呈下降趨勢，而2016年的案件數量為26宗，較2015年的164宗大幅下降了80%以上。然而，根據司法警察局近年的調查結果顯示，2017年電話詐騙的專案調查數量為146宗，較2016年的26宗大幅上升5.6倍。

由此可見，儘管電話詐騙的數量在2015年間有下降的趨勢，但在2017年仍然呈上升趨勢。可見電話詐騙的數量下降可能因為警方的打擊、電話詐騙預防的宣傳而引起市民的關注，令到犯罪份子使用已有的詐騙方式再難以得逞。然而電話詐騙的數量再次上升，明顯可以預見隨着各種通訊科技的發展，犯罪份子開

始採用新興的通訊技術實施詐騙行為，新一波的電話詐騙潮又再開始。

（二）澳門電話詐騙案的種類

電話詐騙於近十年間在澳門出現，尤其自2013年開始，數量更大幅增加。在澳門出現的電話詐騙主要包括：“猜猜我是誰”、中獎詐騙、勒索電話詐騙及假冒內地公安機關工作人員詐騙等犯罪手段，而以假冒內地公安機關工作人員詐騙及“猜猜我是誰”為最常見的兩種詐騙方式。

1. 假冒內地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詐騙案

此類詐騙案是2014年出現的新型詐騙模式，騙徒利用事主害怕牽涉犯罪及服從本澳警察機關或內地公安機關工作人員的心理，騙取金錢。騙徒藉假扮內地政府或其他機構人員進行電話詐騙時，會訛稱是內地郵局或快遞公司的職員，聲稱“你有一份急件未領取”、“你的包裹被海關扣留”；假扮公安人員時聲稱“你的個人資料可能已被人盜用，涉嫌被利用進行清洗黑錢及販毒活動”；假扮內地銀行職員則聲稱“你有信用卡欠費未清還，須繳付高昂利息”。

為了讓事主上當，騙徒會透過科技手段偽造來電顯示，令事主誤以為來電確實是內地公安局、檢察院、公證處撥出；同時，會向事主發出虛假網頁連結，製作仿真度極高的偽冒公安局、檢察院、公證處網頁，其內附有事主相片及正確姓名的假通緝令。當事主不虞有詐，真的以為自己正被通緝，騙徒就要求事主“你須要提供詳細的身份資料及銀行帳戶資料核對”、“快將所有現金存入內地某銀行帳戶，以便公安及檢察部門核實其合法性”，以及“你須要將一筆金額存到內地某銀行帳戶作為擔保金”，以不同藉口騙取事主提供銀行帳號、提款密碼及驗證號碼。事主按騙徒指示完成各步驟後，會赫然發現有關款項全數被轉走。

2. “猜猜我是誰”詐騙案

在此類詐騙案中，犯罪份子會冒認是事主的親友，待事主信以為真後，便會以多個藉口進行詐騙，其中最常見的是自稱在內地犯下刑

事案件被公安機關拘留，並需繳交罰款才可離開，故會要求事主儘快借款以令其可以獲釋。當事主於內地匯款後，有關涉嫌人的電話便會無法接通，故才得悉被騙。而有關涉嫌人的手機號碼及銀行帳戶，均是內地所開設的。

綜合上述有關電話詐騙的案件，騙徒均在外地使用通訊設備及金融工具實行有關犯罪，在整個犯罪過程中，主要犯罪行為均在澳門境外發生，只有犯罪結果是在本澳地區內發生的。

根據司法警察局2017年公佈的數據，其中“假冒內地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詐騙案有119宗，佔所有電話詐騙案的81.5%，所佔比例遠高於2016年的26.9%，成為年內最常見的電話詐騙手段。此類詐騙的對象主要是年齡介乎18至34歲之間的人士，佔73.9%；且較多是女性，佔62.2%。

另外“猜猜我是誰”詐騙案有25宗，是除“假冒內地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詐騙案以外最常見的，所佔比例為17.1%，“勒索電話”詐騙案所佔比例是1.4%，而“中獎詐騙”亦有個別案件發生。

2017年電話詐騙受害人報稱損失總額為40,568,503澳門元，當中97.7%是由“假冒內地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詐騙所導致，另外1.9%是由“猜猜我是誰”及0.3%是由“勒索電話”詐騙產生的。

由此可見，傳統的電話詐騙案的比例大幅下降，近年的電話詐騙方式出現多樣化形式，而受害人上當的比例較傳統的電話詐騙方式高，且損失大部份都是由新型電話詐騙所致。此外還可看出，受害人的年齡也趨年青化，無疑與新興通訊方式在年青人中廣泛流行有密切關係，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各種問題，提高了偵查案件的難度。

三、打擊跨境電話詐騙遇到的困難

打擊跨境電話詐騙案的困難主要有三方面：

（一）騙案集團模塊化及產業鏈化

電話騙案的流程離不開打電話進行配對詐騙、提款轉帳、架設假網站及技術支援等環節。詐騙集團會先由第一部份人員以隨機致電撥打電話方式進行嘗試，並由第二部份人員將網路電話變成語音訊號，以便隱藏身份，大多數會先透過VOS平台將網路電話轉變成語音訊號致電被害人，而被害人接收到的電話號碼，其實並非由電訊營運商所編配的真實號碼撥出的，因此警方難以追查。其後，如有被害人誤入圈套，第三部份人員會製作詐騙用的假網站，並架設轉帳用的網上帳戶等等。而第四部份人員會於被害人匯款後提取轉帳過來的款項。繼而另一部份人員會從不法渠道取得有關被害人的身份資料，並提供予上述部份的同伙使用。而上述所有部份人員均互不認識，只是透過網上平台而建立起合作的關係和互聯，故此形成了模塊化。所以，如其中一部份人員被警方搗破，其他部份人員都不受影響，而且可以很快地在網上尋找另一批人員進行替補，繼續進行有關詐騙行為。

（二）電話詐騙投入低且回報高

電話詐騙係一種投入低、回報高的犯罪形式，而且手法簡單直接，仿效容易。一來電話詐騙經營所需的費用不高，成本低，且一旦成功騙取款項後，少則數萬，多則數百萬至千萬不等，故犯罪的“回報率”極高；二來是與不同環節的人合作的靈活性高，除了策劃者及技術人員外，其他的崗位可隨意尋找人員組成；三是有關手法比較簡單，且相同。

（三）法律制度不同增加追查難度

電話詐騙犯罪是透過通訊工具及銀行進行的跨境犯罪，由於各國各地區的法律制度不同，故在取得異地涉案資料時，程序複雜，周期較長，且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限制。例如澳門需要預先得到法官的命令狀，而內地警方如須查詢或採取其他手段時，則須要上級的批准。以澳門為例，根據第16/92/M號法律《通

訊保密及隱私保護》，以及第32/93/M號法令核准的《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的相關規定，有關通訊資料及銀行記錄警方不能自行提取，必須取得當事人之同意或法官准許的命令狀才能取得；而內地警方則須獲得所屬機關批准，即機關內部的層級監督。縱使雙方程序不同，但警方在提取資料時，都須要經過一些繁複的程序。

同時，在雙方暫未有刑事司法互助法律及協議的情況下，案件發生後可否取得法官的命令狀仍存有不確定性。以銀行帳戶記錄為例，有關款項經常透過多個銀行系統的轉匯進行清洗，而在某些國家或地區的銀行未能提供銀行帳戶資訊時，由於欠缺完整的資料記錄，故有機會令其他證據因不連貫而有所缺失。

在本澳發生的電話詐騙案件，作案者主要是利用內地的通訊工具及銀行帳戶，由於這些工具未有區域限制，故有關涉嫌人士很容易在整個內地使用，因此澳門警方仍須經內地警方調取有關資料作為證據。

四、粵港澳大灣區

在國家倡議的大灣區發展下，粵澳、9+2大灣區城市群及澳珠等各方面合作已進一步優化，而在警務方面的合作亦可進行及嘗試新的合作模式。就警務領域而言，除了口岸邊檢等一系列的合作外，在傳統或新型的犯罪中，尤以澳珠方面，應進一步優化兩地的情報合作、資料互通等工作，在大數據的時代下，建立共同數據庫，以便雙方有需要時，可即時透過有關數據庫取得資訊。尤其澳珠之間的特殊地理位置，有關嫌犯要逃離本澳，大多會經過珠海境地，故每當案件發生時，如能在鎖定犯罪份子的身份後，結合兩地可互通的資訊，對緝捕嫌犯有重大作用。而同時，警方調查在內地犯案後經本澳逃往外地的嫌犯時，亦可根據資訊互通，取得其逃往外地等資料，以便儘快掌握其逃走路線，從而確定進一步的偵查方向。

現時澳門警方為處理跨境電話詐騙而展開的對策，可嘗試根據現有的政策，再以短、中

長期分階段進行，以及有序實施有關方案，達到先預防、後調查，以令市民減少損失，再聯合外地警方偵破有關犯罪團伙。

（一）短期及中長期對策

1. 短期對策

就短期對策而言，澳門近年不斷加大打擊各類電信詐騙力度，在各媒體、報紙、電台、網絡持續加強宣傳，提醒群眾加強自我防範意識，本澳警方已進行的工作包括：

1) 多渠道社區警務宣傳推廣

通過年青人常用的Facebook（臉書）、WeChat（微信）等通訊平台設立宣傳主頁；走訪學校及街道進行防電話詐騙宣傳；成立“滅罪小先鋒”，以加強青少年防罪滅罪意識。

2) 設立防詐騙電話熱線

澳門司法警察局於2017年8月17日開設一條獨立專線“防詐騙查詢熱線”，以便利市民查詢防詐騙資訊。此外，司警局還透過與本澳銀行業務部門合作，對有關涉案帳戶進行緊急安全措施。

2. 中長期可建議及推行的方法

1) 參考外國的預防電話詐騙措施

後續的中長期對策，就是繼續深化與相關部門的協作。建議參考外國採用的預防電話詐騙措施，例如有美國的電訊公司為了保護客戶免於接到詐騙集團的電話而將電訊系統升級，系統更新後可自動偵測詐騙電話，並且直接切斷電話，這樣便可確保客戶不受這類來電的威脅。

2) 修改電訊營運商特許經營合同

警方調查跨境經濟犯罪正面臨着多種掣肘，特別是難以查找透過手機或網上作案的嫌疑人的真實身份。現時於澳門，根據經第29/2016號行政法規修改且經第2/89/M號法令核准之《澳門郵電司組織規章》第二條第一款o)項規定，郵電局須確保電信經營者完全履行營業牌照或特許合同所定的義務。因此，澳門郵電局與電訊營運商須相互協助推進特許經營合同各條款的執行，共同推動解決沒有登記

人身份資料的預付卡，以及實施網絡實名制等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2016年11月7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第24條規定，網絡運營者為用戶辦理網絡接入、域名註冊服務，辦理固定電話、移動電話等入網手續，或者為用戶提供信息發佈、即時通訊等服務，在與用戶簽訂協議或者確認提供服務時，應當要求用戶提供真實身份信息。用戶不提供真實身份信息的，網絡運營者不得為其提供相關服務。

（二）開展刑事警察機關與本地營運商的合作

刑事警察機關可以與本地電訊營運商溝通協作，當本地手機號碼接到懷疑詐騙電話，並且有關通話持續了一段時間，或有數次與懷疑詐騙電話通話時，電訊公司可先發送提示信息（即溫馨提示防電話詐騙信息，以便懷疑受騙市民可再三思考是否已墮入電詐騙局），或者可將有關數據資料即時通報刑事警察機關進行監控，如有關資訊或已有跡象顯示本地流動電話號碼機主是一直與電話詐騙份子在通話中，刑事警察機關可即時採取出入境通知措施，以防事主離開本澳到內地或外地進行匯款，同時亦可要求非本地銀行（如押店、代充支付寶單位等）停止協助匯款。

（三）建立數據互通機制 配合大數據的應用

1. 建立電話詐騙案資料庫

收集現有的電話詐騙資料，存儲每宗案件的被害人資料、詐騙的方式和收款人銀行信息等資料，以便將相同類型的案件進行歸類，並對此作出分析及研究針對性的策略及宣傳方法，提高預防電話詐騙的宣傳效果，以及縮短出現同類案件時搜尋資料的時間。

2. 建立執法部門的數據互通機制

兩地警方亦可透過資訊互通的方式進行合作，例如有關涉案電話號碼以海量形式撥打

時，除了追查號碼的戶主外，亦可根據有關號碼與各城市的電訊營運商加強溝通，以便提前進行堵截，從而減低民眾損失的風險。這就須要建立兩地警方均認可的統一資訊格式，從而解決資訊數據互通時的兼容性；或者建立統一的數據交換平台，以方便兩地數據的讀取及分享。

3. 配合大數據的分析應用

配合“智慧城市”的發展趨勢，利用大數據偵查中的數據關聯性及數據碰撞分析，可以縮短跨境調查的時間，加快偵破案件的速度，將受害人的損失減到最低。同時建立警務大數據庫，將大數據推廣應用於各類犯罪案件中，從而達到逐步實現“科技強警”的目的。

（四）將法律制度規定落實到位

前述的各種制度迫切地須要制定相關的法律制度，以便在數據收集、搜尋及互通上有法可依，也可以避免數據被濫用的風險；還須平衡數據收集與個人隱私的關係，為保障居民的個人隱私，須規定警方僅可收集以機器語言方式傳輸的數據。早前，澳門也就此進行了《網絡安全法》的公開諮詢工作。

另外，亦可與內地公安機關及內地銀行業務部門合作，着銀行職員詢問客戶開戶及轉帳原因，提示電話詐騙的風險，並延遲內地銀行轉帳交易時間。

同時，在大灣區各城市間的警務資訊協作，亦可按前、中、後期進行優化，以逐步完善整個區域內各城市的協作模式：

1、與各城市的電訊營運商合作，根據數據分析不停發出預防電話詐騙犯罪的資訊；

2、與通訊及支付軟件商合作，植入預防電話詐騙犯罪資訊；

3、各相關部門可在社交網站植入預防電話詐騙犯罪資訊；

4、建立數據資料庫，內含有關被害人資料、收款人銀行帳戶和作案人電話號碼等；

5、於巨額轉帳過程中，透過銀行職員或以電腦方式作出查問及提醒等；

6、以大灣區為試點，利用資訊共享，協力追查及封鎖有關帳戶。

五、結語

電話詐騙犯罪是一種新型的科技犯罪，極具跨域性、隱蔽性，對警方的調查工作造成極大的困難，而作案者使用可隨時改動的流動電話號碼實施詐騙行為，令市民防不勝防。由於現時各國、各地區等法律體制不一，故增加了追查、拘捕等行動的難度。雖然在澳門保安司的領導下，以及在推動主動警務、社區警務及公關警務等前瞻性的警務理念下，於預防電話詐騙的工作方面已取得重大成果，但根據被害人的年齡層及職務背景，近年電話詐騙的受害

者大多是較年輕、具高學歷等人士，這方面必須得到關注和着力應對。

澳門保安司於2018年提出智慧警務的理念，配合國家倡議的9+2大灣區城市發展的前提，再進一步優化澳珠兩地或9+2城市群的協作，並以9+2城市群進行新一代的警務合作。在現今的大數據時代，資訊掌握尤其重要，因此可嘗試推進澳珠兩地基本資料互通，澳珠兩地警方可互相借鑑、互補長短，尤其在聯手預防及打擊屢禁不止的電話詐騙集團方面，更需要多方面合作溝通，守好預防犯罪的第一線，令詐騙集團少了可觀的利潤，並最終令其無以為繼。

參考資料：

1. 林先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經濟整合研究》，南方出版傳媒，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
2. 陳廣漢、楊柱、譚穎：《區域經濟一體化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
3. 鍾麗英、李素榮：《跨境電信詐騙犯罪問題的分析及對策》，第一屆“澳門·珠海警務論壇”論文，2010年。
4. 任雪峰：《對打擊跨境電信詐騙犯罪的思考》，第三屆“澳門·珠海警務論壇”論文，2014年。
5. 任雪峰、李素榮：《論打擊跨境電信詐騙犯罪的實戰方略——以部署“8.12”跨境電信詐騙專案為例》，第四屆“澳門·珠海警務論壇”論文，2016年。
6. 鄭錦耀：《對打擊跨境電話詐騙的思考》，第四屆“澳門·珠海警務論壇”論文，2016年。
7. 第2/89/M號法令《核准郵電司新組織章程》。
8. 第5/2006號法律《司法警察局》。
9. 《澳門公共電訊服務特許合同》。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
11. 司法警察局 2018年迎春座談會資料：“2017年電話詐騙之分析報告”。